

(上接 Z02 版)

山东之所以成为中国蚕桑最重要的产地,原因之一是气候。仰韶文化到殷墟时代,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潮湿,接近或相当于今亚热带气候水平。山东东部沿海属海洋性气候,温暖潮湿;中西部河湖遍布、丘陵较多,既适合桑树种植,也利于蚕茧越冬。原因之二是土壤。《尚书·禹贡》把中国九州的土地分为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、中中、中下、下上、下中、下下九个等级,今山东所在的兖州为上中,青州为上下。尤其是青州土壤肥沃,略含碱性,适宜桑树生长。台湾学者邹景衡认为,世界上桑树的分布大致限制在北半球,其中以白桑最为普遍,此桑为古青州原产。有桑才有蚕,才有对野蚕的驯化,进而产生了桑蚕业。他据此认定山东是中国蚕业的发源地。原因之三是技术。《管子》说,莱人善染练,尤其善于染紫。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纺织机,被称为鲁机。汉代青州培育出的便于采集桑叶的地桑,被称为鲁桑。“鲁缟齐纨”一度成为中国名贵丝绸的代名词。原因之四是政策。齐鲁古国一直把桑蚕业作为经济支柱予以培育。齐桓公时期对养蚕能手和防虫能手予以大张旗鼓地奖励,并且诏令百姓住宅四周只准种植桑树,从而出现了《考工记》中“齐鲁千里桑”的景象。

考古发掘也证实,山东自古就是丝绸的主要源头。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纺轮、骨针、骨梭,证明早在悠远的古代,山东就出现了丝织业。西方探险家斯坦因曾在敦煌发现“任城国(今山东济宁)亢父缣一匹”。1985 年,济阳县刘台西周墓出土玉蚕 22 个,以雕刻手法再现了蚕的一生。临淄郎家庄一号春秋殉人墓出土的两块纬锦,也反映了齐国高超的丝织技术。

水满则溢。日渐过剩的山东丝绸产量,迫切需要一个出口。由是,伟大的丝绸之路应运而生。

六、从丝绸源头到丝路起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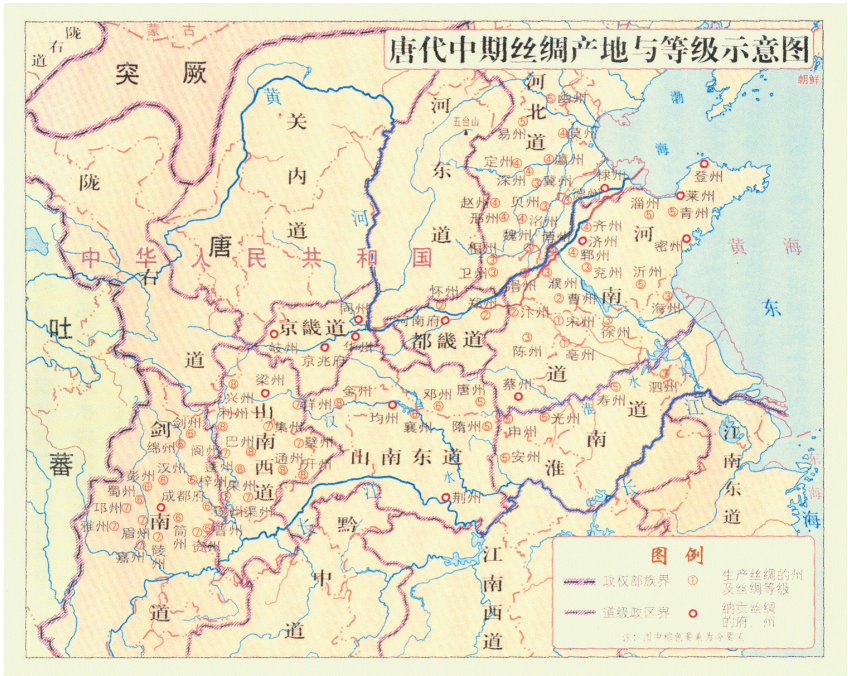
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后,高度集权的中原王朝一直通过朝贡、互市、和亲等方式,牢牢控制着丝绢贸易的主导权。《唐律疏议》卷八中的“关市令”赫然写着:“锦、绫、罗、縠、绸、绵、绢、丝、布……不得度西北边诸关及至沿边诸州贸易。”也就是说,丝绸如同今天的枪支、炸药一样,不仅是贵重物品、紧缺物品,而且是违禁品,只能官方经营。

从汉代开始,官方就在大中城市划出一个或多个区域作为“市”。市的四周有围墙,与居民区分隔,市内由官府建造店铺,所有买卖必须在市内进行。市楼上插旗表示开市,降旗表示罢市。管理长安东、西市 的官员叫“市令”,一般城镇管理市的叫“市长”。市的官员负责为商贾注册登记,为大宗交易契约加盖官印,定期评定物价、检验商品质量、验定度量衡。每一种丝绸商品都要区分等次,如细绵绸、次绵绸、粗绵绸;每一品又分为三等价格,称为上估、中估、下估。物价十日一定,不得擅自变动。倘若官府收购丝绸,就按中估定价,不准讨价还价。

异域商旅进入中国,一般要随使团前来,零星商旅很难入境。进入中国后,要凭申请到的“符传”或“过所”到指定的市进行交易。外国商旅购买的绵帛,须立文契,买卖双方要与保人签字画押,并经官方验证。中外贸易一般在边关政府所设的边市进行,朝贡贸易则在京城进行。

这样一来,朝廷驻地自然成了丝绸的主要集散地,而生产丝绸的地区只能扮演生产者角色,利益也就大打折扣。

尽管如此,由于丝绸价格远远高于粮食,就使得丝绸技术在全国的传播有了强劲动力。《唐六典》载,在全国十个道中,有六个道向朝廷贡赋丝绢,它们是,今山东大部所在的河南道的 24 个州府,河北道(今河北)的 16 个州府,剑南道(今四川)的 11 个州府,山



南道(秦岭以南)的 6 个州府,关内道(秦岭以北)的 4 个州府,淮南道(江淮地区)的 3 个州府。由此可见,中国丝织业的版图,已经由秦汉时期山东一枝独秀,演变为隋唐时期的万木竞芳。必须指出的是,唐代今山东地区向朝廷缴纳丝绢的州府共有 16 个,数量仍居全国之首,分别是曹州(今定陶西)、濮州(今鄄城)、郛州(今东平)、济州(今东阿)、齐州(今济南)、淄州(今淄川)、青州、莱州、登州、兖州、徐州、德州(今陵城区)、博州(今聊城)、棣州(今阳信)、沂州(今临沂)、密州(今诸城)。另外,宋州(治河南商丘,辖今山东曹县、单县)、魏州(治河北大名,辖今山东冠县、莘县、阳谷)、贝州(治河北清河,辖今山东武城、夏津)也是缴纳丝绢的重点地区。742 年,山东纳绢州府总户数 101.7 万户,占全国纳绢州府总户数的三分之一;上缴丝绢 228 万匹,占全国的 34%,平均每户 2.24 匹,仍是全国最密集、最普遍、最集中的丝绸供应地。

至于秦汉两代山东丝绢的质量,有三个典型的例子。一是《史记》记载,秦朝宫中最常用的丝绢就是“阿绢”。二是司马迁说,齐鲁之人如果拥有千亩桑麻,这个人的财富就可以与千户侯相比。三是《汉书》说,朝廷设有两个纺织厂,名叫服官。一个设在襄邑(今河南睢县),历史记载不多;一个设在山东临淄,负责为皇帝生产冬春夏三季服装,所以又称三服官。汉武帝时期,三服官每年动用织工数千人,耗资数万万,也只能产出 100 件左右的御服,那将是多么精细、多么美观的纺织精品呀。

那么,丝织业已扩展到大半个中国,山东的丝织品质量是否有所下降呢?《唐六典》将各州贡赋的丝绢分为八等,三等以上叫上绢,四、五等叫次绢,六、七、八等叫下绢,八等之外属于等外绢。山东生产上绢的州府 9 个,生产次绢的州府 7 个;河南生产上绢的州府 7 个,生产次绢的州府 3 个,生产下绢的州府 4 个;河北生产上绢的州府 4 个,生产次绢的州府 11 个;安徽生产次绢的州府 3 个;湖北生产次绢的州府 1 个,生产下绢的州府 2 个;陕西生产下绢的州府 1 个;四川生产下绢的州府 30 个;福建生产下绢的州府 3 个。其余州府生产的皆为等外绢。山东不仅生产上绢的州府居全国首位,而且所产的丝绢全部列入了上绢与次绢,其中大部分是贡品。贡品主要有曹州、濮州、郛州、德州、棣州的绢,青州的仙纹绫,兖州的镜花绫,齐州的丝葛,博州的绸。由此可见,唐代丝织品的质量,山东居首,河南、河北次之,四川、江南又次之。台湾史学家严耕望在《唐代丝织工业之地理分布》一文中也说:“有唐一代,巴蜀所产丝织品要胜于江南所产,但巴蜀丝织品质量的总的趋势比山东所产为差。”

综上所述,从汉到唐,京城长安、洛阳

是全国丝绸的集散地,山东是丝绸的主要源头。但上述结论只是统一王朝时代的典型表现,而在汉唐之间的分裂时代,情况就大相径庭了。

三国、西晋和北魏时期,中国北方尚且处在一个政权控制之下,丝绸传输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。北魏灭亡后,西魏、北周相继占有关中,控制了丝绸之路;东魏、北齐则占据黄河下游,控制着丝绸源头。西魏、东魏时代,长安丝绢不能再通过贡赋征调,西北地区的丝绢价格陡然上升,商人们只能前往黄河下游尤其是山东采购。到了北周、北齐时代,北齐一直限制向北周输出绢帛。直到 570 年,北齐后主高纬为了取悦皇后,向北周索取真珠,对方提出以上乘的丝织品相交换。高纬派人带上 3 万匹锦彩前往北周换取真珠,才阴差阳错地打开了丝绢大门。随后,大量胡商涌向山东。《周书·吐谷浑传》记载,一个吐谷浑使团从北齐返回时,就有随行胡商 240 人,驼、骡 600 头,带回杂彩丝绢上万匹。青州出土的北齐墓石刻画像中,有一幅胡商与齐商贸易图,图上的胡商让仆从捧着一件地中海特产——红珊瑚,而齐商跷着二郎腿坐在绣墩之上,居高临下,泰然自若,一副老谋深算的奸商派头。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动乱时期,山东扮演了丝绸源头与丝路起点的双重角色。也就是说,丝绸之路的起点已经由长安、洛阳东移到了山东。

而且,据专家考证,中国丝绸先东传到朝鲜、日本,后西传到中亚、西亚直至欧洲。今日本奈良的正仓院藏有 17000 件古代染织品,法隆寺也有 3000 件古代染织品,其中大部分是产自中国东部的丝织品。

而运输这些丝绸的港口,多是登州。

七、知州苏东坡

东方云海空复空,群仙出没空明中。荡摇浮世生万象,岂有贝阙藏珠宫?心知所见皆幻影,敢以耳目烦神工。岁寒水冷天地闭,为我起拔鯢鱼龙。重楼翠阜出霜晓,异事惊倒百岁翁。人间所得容力取,世外无物谁为雄。……

这首《海市诗》,作者是苏轼。他在创作缘由中说,我听说登州市已经很久了,当地父老说:“海市一般出现在春夏季节,如今已近年末,海市是不会出现的。”我到任五天就被迫离任,以见不到海市为遗憾,所以向海神广德祠祈祷,第二天居然见到了海市,于是欣然创作了这首诗,时间是 1085 年。

那么,苏轼到底是何种原因来到登州,又为何到任五天就匆匆离开?

苏轼,四川眉山人,字子瞻,世称苏东坡,苏仙,生于 1037 年,是宋代最有才华、最

有风骨、仕途最为坎坷的人。

说他最有才华,证据之一,是 20 岁就高中进士;证据之二,他 24 岁参加制科考试,被录入最高等——第三等,成为宋代唯一进入该等次的人;证据之三,他做事情,要么不做,做就做到极致。他的散文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,他的词领衔宋代三大文豪,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,他的书法《寒食帖》被誉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,他的画在描绘墨竹、怪石、枯木上别有风致。就连做菜,都能做出名堂,风靡九州的“东坡肉”就出自他手。

说他最有风骨,集中体现在对变法的态度上。1069 年拉开帷幕的“王安石变法”,是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运动,尽管变法在客观上充实了政府财政,提升了国防实力,但由于内容过于激进,加上执行中的不良运作,因此自始至终遭到部分人的强烈抵触,从而形成了变法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。说不说新法的好话,成了划派的唯一标准。从根子上说,苏轼乃求新之人。变法初期,他也写了一些变革文章和奏疏,有的观点比王安石还要激进。可当他发现变法不切实际,对百姓不利时,便开始为新法的不足进言,结果受到执政者一再打压。多年后,终于熬到保守派上台,他咸鱼翻身了,按说应该感恩戴德地站在保守派一边。但他是一个坦荡如砥、表里如一的人,一个有着耿耿风骨的人,一个大写的人。他认定,说真话是一个文人的良心。因此,在保守派不加选择地全面废除新法时,他再一次站了出来,公开反对废除免役法。由此,他又得罪了保守派,再次遭到贬斥,甚至受到一再戏弄。

说他仕途坎坷,是指他一生三起三落。第一起,通过科举考试,顺利踏上了仕途;第一落,因“妄议”变法被贬出京城,八年换了四个地方;第二起,是宋神宗驾崩后,高太后临朝听政,保守派首领司马光接管内阁,高调起用屡遭打压的苏轼。他先是由团练副使升任正六品朝奉郎,知登州。任命仅仅发出 5 天,他就被召回朝廷,高太后还公开赏赐了他。此后半年内又三次升迁,成为正三品的皇家近臣。第二落,是身居高位的他反对全盘废除新法,结果惹恼了保守派,被外放杭州知州(从三品)。第三起,是两年后,被保守派召回朝廷。第三落,是回到朝廷不久,他又因对变法的评价与保守派发生争执,得了个“顽冥不化”的恶评,然后被外放。被外放的第三年,高太后去世,宋哲宗亲政,新党卷土重来。但在新党看来,在本质上他仍然属于保守派,只能把他管得更严,整得更狠,踢得更远,结果贬到南海边的惠州,进而贬往天涯海角的儋州,直至病逝。

前文谈到,调任登州,是苏轼第二起的第一站,职位是知登州军州事,也就是登州最高军事行政长官。

1085 年 10 月 15 日,苏轼到任。20 日,接到进京赴任的诏书。11 月 7 日左右,正式离开登州。他在蓬莱的时间充其量只有二十几天。

此时的登州,尽管仍有商船与使船停靠,但已不复宋朝初年千帆交错、百舸竞渡的繁华。早在 1042 年,为防范契丹从海上进攻,宋朝就在登州修建了“刀鱼寨”,标志着这个千年古港由自然港变成了人工港,由热气腾腾的商贸港口变成了死气沉沉的海防要塞。

苏轼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,不仅浏览了登州的奇观,留下了十多篇诗文佳作;而且以一颗赤子之心,马不停蹄地视察海防、巡查官仓、走访民户,回京后向朝廷上了两个奏折,一是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》,请求强化登州海防建设;二是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。依照他的建议,朝廷废除了当地的食盐官营专卖制度,改为由沿海盐民(灶户)直接卖给地方百姓,官府只收盐税,既保护了盐民的生产积极性,又降低了交易价格,减轻了百姓负担。(下转 Z04 版)